

## 法国汉学界对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下)

耿 昇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明末清初的16—18世纪,是中西两种文化首次撞击的时代。这次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流媒介,是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无论是在中学西渐方面,还是在西学东渐领域中,都做了许多有益的、他人无法取代的工作。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法国汉学界在该领域中始终居领先地位。本文对法国汉学界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鸟瞰式评介。

**[关键词]**入华耶稣会士;中西文化交流;法国汉学界;明末清初

**[作者简介]**耿 昇(1946—),男,河北省阜平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法国文学艺术勋章获得者,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和东亚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2-0180-07 **[收稿日期]**2003-04-20

中西方各界,根据入华耶稣会士们的中国资料,各自形成了对于对方的看法。这一点始终是法国学者们研究的热门。本文在此仅提及两本书,作为例证而加以介绍。

第一本书是法国华裔学者丁兆庆的《1650—1750年间法国人对中国的描述》,于1986年再版(原版于1928年)。原书由当时法国著名的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作序。该书从各种法国著作中辑录了1650—1750年间法国的传教士、政界人物、商人、神学家、旅行家、航海家、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尤其是哲学家)们论述中国的言论,实际上是对当时那场“中国热”风潮的一种全面再现。全书共分十二章详细论述。

第一章是对1650年之前法国人有关中国知识的综述。其中第一部分论述了1650年之前的中欧关系,从上古时代的“赛里斯”人到汉代的“大秦”、唐代的景教、元代的方济各会士与其他使节、明代的旅行家与航海家,直到法国耶稣会士们于明末入华。第二部分是讲1650年北京第一座教堂的建造以及清朝康、雍、乾三帝时代的中法关系。第二章是讲1650—1750年法国人论述中国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入华传教士们的著述,以及围绕着中国礼仪之争事件所出现的论战性著作。第三章是《教俗旅行家们论中国》。17—18世纪入华的法国教俗人士很多。传教士们一般都对对中国大加赞扬,而那些世俗人士却看到一种愚昧和卑微的中国形象。这是由于传教士们在中国生活得时间长,且又肯下苦工夫去研究中国文化,而世俗旅行家和商人们只是来

去匆匆、无文化修养的过客,再加上他们与中国人做交易时难敌精明的中国人,自觉无暴利可图,故而形成了这种差异,造成了他们对中国的负面印象。第四章是《法国人论中国的历史》,主要是罗列了当时法国人撰写、翻译和编译的大量中国史著作。第五章是《法国人论中国的地理》,主要介绍了法国传教士们奉康熙皇帝的诏令而测绘中国地图的过程,特别是法国地图测绘家宋君荣神父的在华活动情况。第六章是《法国人论中国的民族学》,重点介绍了中国的不同民族及其社会伦理状态,特别是巴多明有关“地理和气候形势对人类影响”的著名论断。第七章是《中国的文学在法国的传播以及傅尔蒙研究中国的方法》,其中详细罗列了当时法国论述中国著作的刊本、在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宣读的论文、赫苍碧(J.-P. Hervieu, 1671—1764)的《古文》译本、马若瑟的《诗经》译本等一大批著作。第八章是《中国的戏剧在法国》,主要是介绍迪夫雷斯尼(Dufresny)有关中国狐仙鬼怪故事的戏剧以及在集市上上演的那种实际上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所谓“中国戏”,特别是有关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和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之争。第九章是《中国的儒教在法国》,主要是论述被认为是基督教先驱的孔子和被归于中国学者们的无神论。第十章是《中国的哲学在法国》,论述了中国皇帝对孔子的宠爱、传教士们将中国哲学中的民主和社会思想引入法国、传教士们的职业使他们无法接触中国知识界等。第十一章是《中国在17—18世纪的法国》,主要论述当时法国获得几乎是完整的中国思想和形成中国形象的全过程。第十二章是《理想化

的中国形象在法国),主要是论述当时法国遇到了伦理和政治危机,意欲依靠中国例证和受中国启发而引入新思想,从而改造法国社会的美好愿望。总之,此书虽然是寻章摘句,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但它毕竟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法国17—18世纪的“中国热”之风潮。

第二本是华裔法国学者齐安德(André Chih)于1969年出版的《中国人看基督教西方》一书。全书共分五章,详细论述了中国人于近代之前所形成的西方观。它与丁兆庆一书相映生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人通过西方旅行家、传教士与商人而了解到的西方。中国人最早将欧洲人统称为“蛮夷”、“番”、“胡”和“洋人”,甚至对于耶稣会士们也一概如此称呼。中国人开始时始终坚持认为中华帝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而蛮夷人都是残暴和不道德之徒。中国人当时关心并从事调查的西方国情是:调查西方的势力、军事艺术和装备,采取的对策是“师夷之长技”,即学夷语和译夷书,派遣留学生和使节、学习西方的军事艺术;调查西方聚财手段——贸易、交通、采矿、经济制度,应对的措施是仿效西方,最终认识到了“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调查西方物质文明之源泉——实用科学及实用科学发达的原因,采取的态度是采用西方科学却不能因引入西学而在中国教育中激起混乱;调查西方对物质文明的制控手段——官府与组织,决策是西方式的变法、改良或革命派。该书的第三章讲到了中国因发现西方而爆发的一场大争论:中国是否应“夷化”、中国文明是否具有优越性、西方政治究竟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对西方文明是否应批判、西夷的一切长处是否均源自中华帝国、经典是否具有永久性、西方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否互相结合,由此而产生了一种黄金理论——中体西用,但在实施中却有很多困难。第四章是论述基督教在西方物质文明中所起的作用。其中,提出了中国是否忽略了基督教以及儒教之成见诸问题。西方生活对中国的影响(宗教生活、思维想象、教派与宗教之争、对待异教徒的态度、迷信教派等)、中国对西方的恩怨或仇恨、宗教作为西方侵略的工具、传教士们干涉司法并提出了物质要求、中国人对于传教事业的看法、中国政府处理教务的措施、中国新闻界与中国文人有关基督教的观点等内容。第五章是探讨中西方关系:中国人看到的西方日常生活,西方人的相貌、语言、烹饪、衣着、男女关系、舞蹈、婚姻、孝道与离婚、女子教育、住宿、街道、所谓的社会平等、医学、体育、新闻、艺术、戏剧和摄影、西人的性格、东西方之间的殊同、伦理差异、两种文明的特征。在结论部分,该书讲到了礼仪之争后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隔绝、中国寻求一种新文明的结果、西方对于中国的误解之原因、东西方文明的相会等。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 Wilhelm von Leibniz, 1646—1716)是欧洲17世纪末、18世纪初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其学术涉及到了数学、哲学、逻辑学、历史学、法学、力学、地质学、语言学和神学诸领域。莱布尼茨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中都受到了中国影响。研究莱布尼茨与中国的关系,通过莱布尼茨来研究中学西渐始终是一个重要课题。笔者在此仅对法国近些年来出版的三本有关莱布尼茨与中国关系的著作作些简介,它们可说是这方面研究的扛鼎之作。

法国学者奥里维埃·卢瓦(Oliver Roy)于1972年在巴黎出版了一部《莱布尼茨与中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未曾有蒙昧人居住过的国家。他通过莱布尼茨有关中国的论述,而竭尽一切努力来解释那个时代有关中国的神话。全书在对西方17—18世纪“中国热”的历史作了一番勾勒之后,重点介绍中西方思想的比较问题。然后又论述了中国人的玄学、语言和《易经》以及莱布尼茨对这三个问题作出的答复、莱布尼茨有关西方基督教与中国自然神论之间的吻合性、将汉语作为世界语和世界之政治统一诸问题。

这部书分为五编二十一章。书末附有研究莱布尼茨与中国的详细书目。其第一编是《莱布尼茨时代的中国与欧洲》。下设四章:《明清时代的中国》、《欧人进入中国》、《礼仪之争在远东》和《礼仪之争在欧洲》。这一编主要阐述了莱布尼茨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作者认为,17世纪末至18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达到了其鼎盛时期,与经过16世纪之前的“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的欧洲,各自屹立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分别代表着东西方两大文明,势均力敌;双方于此时完全可以平等对话,故出现了导致欧洲“中国热”风潮的形成,以及一大批研究中国问题专家诞生的环境与氛围。莱布尼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应运而生。但这两大文明毕竟差异很大,欧洲崇拜中国文明的精英人物层出不穷,敌视中国文明者也不乏其人,故而在欧洲爆发了持续长达两个世纪左右的中国“礼仪之争”。作者认为,这场争论主要集中于五大要点上:汉文中Dieu(上帝、天、天主)的名称、康熙赐给北京耶稣会士们题额中的“敬天”二字(认为“天”具有物质与世俗之义,与神学不能相容)、中国人的祭祖(迷信色彩)和尊孔问题(孔子与上帝的争宠之战)、祭祖灵牌问题(偶像崇拜)。中国礼仪之争在欧洲挑起了一些重大哲学和宗教问题的辩论,并最终导致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第二编是《莱布尼茨与中国传教区》。主要论述了莱布尼茨的资料来源和著作、莱布尼茨的世界和平共

处论与中国。莱布尼茨获得中国资料的主要渠道是与入华耶稣会士们保持着通信关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于欧洲会见他们,阅读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著作以及西方人士根据他们的著作而编写的有关中国的著述。他重点阅读了祈尔歇(Kircher)的《中国图志》(1667年)、柏应理的“四书”译本、《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白晋于1707年寄给莱布尼茨),以及一大批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著作,如李明的《中国现实新志》、龙华民的《论中国人宗教的某些问题》等。他与白晋神父保持着长期的通信关系也使其受益匪浅。莱布尼茨有关中国的著作主要是《就中国哲学问题致雷蒙的信札》以及由他负责出版的《中国近事》,但他在诸多书简和各种著作中都谈到了中国。他意欲将其世界共处论运用到中国,以实现其世界统一的美梦。

第三编是《莱布尼茨与中国思想》。下分五章论述:《什么样的中国思想?》、《龙华民有关中国人寿数的论著》、《莱布尼茨与中国思想》、《莱布尼茨和中国礼仪之争的具体观点》、《莱布尼茨对汉文文献的注释》。当时,在欧洲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就是研究中国思想的参照点。莱布尼茨如同入华耶稣会士们一样,都认为主要应参照中国的古文献,特别是参照“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因为儒家经典的疏注文字均遭道教徒和佛教徒所歪曲,而外方传教会的会士们更偏爱于疏注文字却忽略原著。所以,莱布尼茨极力推动将“四书”和“五经”等中国儒家经典译成西文而刊行。这样,便有力地推动了中学西渐。龙华民的《论中国人宗教的某些问题》算得上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比较系统而又准确地论述中国宗教特别是中国玄学的著作,但莱布尼茨却需要获得更具体的资料以评价中国的自然神论。他有关中国思想的主要观点都反映在他的《就中国哲学问题致雷蒙先生的信札》中了。该信札的目的是为了对柏应理和利安当的著作作出回应。其主要内容是:什么是第一本原;“理”是否合理;“理”是否为造物主。他虽然经常重复柏应理和利安当的中国人的“唯物论”和“一元论”,但他又认为中国人既不宜扬物质和精神之间的二元论,也不主张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在礼仪之争中,莱布尼茨于“上帝”、神灵、精神和物质、精神和力量、神灵和祭祀、人类灵魂等问题上都持独特见解,并对这些名词的含义作了不落俗套的诠释。

第四编是《莱布尼茨和汉语》。下设五章论述:《神学的偏见》、《莱布尼茨和世界语》、《莱布尼茨的汉文知识》、《莱布尼茨和可作为世界语的汉语》、《莱布尼茨在汉语世界语问题上的犹豫心态》和《汉语是否作为一种哲学语言》等。神学家们有一种偏见,认为亚当的语言是一种神语,后来却被遗忘了,大家都在寻找其踪迹。莱

布尼茨也认为存在着一种由上帝或亚当创造的“原始语言”,但他又怀疑这种语言不是世人所说的希伯来语。他通过对汉语、汉字和汉语语法的研究,认为汉字有一种超自然起源、被归为了伏羲的创造。所以,他力主汉语可以作为一种世界语。

第五编是《莱布尼茨与〈易经〉》。下分《欧洲对〈易经〉的介绍》、《白晋论〈易经〉》、《莱布尼茨论〈易经〉》和《〈易经〉中的科学》等专题论述。由于莱布尼茨在《易经》八卦与他的二进位数学之间发现了某种共性和联系,所以他才注重对《易经》的研究。

1987年,法国学者克雷蒂亚娜·弗雷蒙(Christiane Frémont)出版了《莱布尼茨有关中国人自然神学的论述》一书。全书共分三部分,附有详细的注释、莱布尼茨的著作目录和年谱。其中,第一部分是综述,详细论述了莱布尼茨研究中国、中国人的宗教和著作的历史。第二部分是莱布尼茨有关中国神学的论述,主要是发表了莱布尼茨为《中国近事》写的序言以及对此书所作的提要、莱布尼茨就中国哲学问题致雷蒙的信札全文。最后是附录,包括莱布尼茨就中国问题致韦尔朱思(Verjus)神父的七封信札、《论对孔夫子的世俗崇拜》、致白晋神父的两封书简、致德·博斯(Des Bosses)神父书简的节录等原始文献。所有这些著作均为莱布尼茨在欧洲推动传播中国文化的代表作,对于中学西渐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莱布尼茨为了获得研究中国的资料,与入华耶稣会士们长期保持频繁的通信关系。这批书简经里达·维德迈(Rita Widmaier)汇辑和筛选,于1990年出版了《莱布尼茨中国书简集》。此书搜集了莱布尼茨与入华耶稣会士之间的七十一封书简,从1689年7月1日起至1714年2月5日止,长达二十五年之久。这七十一封书简中只有十二封过去曾公布过。与莱布尼茨保持通信关系的有入华耶稣会士闵明我、利国安、白晋、洪若翰、杜德美和刘应等法国会士。此外,该书中还包括莱布尼茨与韦尔朱思、郭弼恩等一代欧洲文化名流们的交往书简。该书的前面附有维德迈介绍莱布尼茨对中国的研究及其与入华耶稣会士们保持通信关系的背景、书简的内容和它们在西方产生的影响。编者对每封书简都作了详细注释,书末附有研究莱布尼茨与中国关系的书目及详细索引。这批书简大都是用法文写成的,只有少数系用拉丁语所写。

在中国文化西传的问题上,于哲学层面表  
 九 现得尤为突出,耶稣会士们也非常注重调查研  
 究高度发达的中国伦理哲学,当时的西方人也  
 爱高谈阔论这一话题。法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两本代  
 表作。

第一本是维吉尔·毕诺(Virgile Pinot)的名著《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1640—1740)》，于1970年在日内瓦重印。全书五十余万字，分上下两卷。上卷是作者撰写的国家级博士论文，分为三编六章；下卷是他为撰写其博士论文而利用的《有关法国认识中国的未刊文献》。该书现已成为研究中学西渐的经典性著作，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该书有笔者的中译本。

在书中，毕诺将第一编定名为《有关法国认识中国的起源》。分为三章：第一章是《耶稣会士和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主要论述了17世纪远东的天主教传教区和法国派向暹罗的使节，这是法国认识中国和中学西渐的基本队伍；第二章是《中国礼仪之争》，详细介绍了礼仪之争的起因、发展以及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这是中学西渐的社会背景；第三章是《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的著作》，这些著作是法国认识中国以及中国在哲学方面影响法国的基本资料，这是中学西渐的渠道和手段。第二编定名为《发现中国和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在第一章《中国历史和纪年的古老性》中，作者认为中国古老的历史远远超越了《圣经》的历史，向《圣经》纪年和基督教提出了挑战，是中国震撼欧洲的一大原因。在第二章《中国人的哲学和宗教》中，作者分别论述了法国传教士和神学家、哲学家、“索隐派”信徒对于中国哲学和宗教的不同看法，也就是中学对欧洲不同阶层人物的影响。由于中学对欧洲影响最多的是在哲学、宗教、伦理和政治方面，故笔者想重点介绍一下毕诺有关中国对法国及欧洲哲学家们(包括培尔、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布里尼等)施加影响部分的论述。虽然这些学者对中国的观点不尽相同，甚至还互相矛盾，但他们都受到了中国的影响，是中学西渐的重要队伍。

培尔主要不是由于中国古老的纪年问题，而是出于反对路易十四排斥异己的行为才转向关心中国问题的。他从中国皇帝以最高礼遇接待传教士们的决策中看到了中国的宽容行为。培尔认为，偏执狂和排他主义并非出自对宗教问题的冷淡，而是基督教的一种必然结果。他于1700年之前主要是关心暹罗而不是中国。由于他是一位博览群书的作家，所以也关心耶稣会与巴黎外方传教会之间的争执，最终认为中国的尊孔并不是一种偶像崇拜。他不仅仅满足于阅读柏应理神父的《实用伦理学》，而且也阅读耶稣会士们三大名著和李明神父的著作。他甚至企图证明无神论要大大优于偶像崇拜，认为反击基督教独神论的最好例证就是中国。因为中国不仅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而且还具有非常崇高的伦理。中国的无神论使其民族繁衍的时间比欧洲要长得多，它与伦理没有任何矛盾。由

于中国文人都是哲学家和“活跃的无神论者”，所以中国的例证对于批判基督教的独神论至关重要。

马勒伯朗士采用了《一名基督教哲学家与一名中国哲学家的对答录》为标题，这绝非仅为哗众取宠。当时在那些有关东西方哲学家论战的著作中，往往是东方哲学家们获胜。原入华耶稣会士傅圣泽(J.-P. Fouquet, 1665—1741)与马勒伯朗士友谊非同一般，并声称惟有其形而上学的理论才能够打动中国人。其《对答录》是专为传教士们写的一种指导手册。他认为，在斯宾诺莎的不信教论和中国的无神论之间有许多联系。

莱布尼茨是17世纪中最早并以最顽强精神长期关心中国问题的人。他非常钦佩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J.P. Colbert, 1619—1683)的计划，在中国和整个东方寻找上古时代的遗迹，以用来研究民族起源以及世界上更多事物的起源。他对于中国语言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认为这是一种原始语言或母语。他要求拉·克罗兹(La Croz)学习汉语，认为汉语比亚美尼亚语更适宜研究《圣经》。由于中国历史极其古老，中国的智慧是一种不可估量的财富，所以他大力支持向中国派遣数学家耶稣会士，并如饥似渴地阅读他们的著述。他甚至认为应该要求中国向西方派遣治国圣贤，向基督教世界传授治国术和自然神学。他最早提出中国哲学更接近基督教神学而不是希腊哲学的论点。

德·布里尼(de Burigny)为了调查中国人的宗教，曾向培尔和雷诺多(Rénaudot)请教，从而也得出了中国人是无神论者的结论。这就证明无神论曾是哲学家中的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均应该如此。

第二本书是1994年出版的马克·克雷本(Marc Crpon)编写的文集《西方哲学年鉴中反映出的东方》。这本文集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较为通俗易懂，是有关中国哲学在西方的传播及其影响的一部代表作。全书除了长篇序言和丰富的参考书目外，在正文第一章《批判的模式》中，辑录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伏尔泰的《风俗论》、阿尔让斯侯爵的《中国人的信札》、重农派学者魁奈的《中国的专制主义》、杜尔哥的《中国问题》、百科全书派作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的《两个印度的历史》中有关中国的论述。第二章《演变关系的研究——探源》中，摘引了赫尔德、琼斯、施莱格尔兄弟、洪堡等人的著作、书信和讲演稿。其中，德国批评家、哲学家、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和狂飙运动的理论家赫尔德(J.G. Herder, 1744—1803)，是由于批判启蒙时代的语言哲学和历史哲学才转向东方学研究的。在他的有关人类历史哲学的著作中，中国和

印度始终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希望用东方哲学来发展西方哲学。该书摘引了他《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有关中国和印度的几章文字。英国的东方学家、思想家、加尔各答亚洲学会的创始人和首任会长琼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曾于1780年左右在英国印度总督哈斯汀的支持下从事有关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法律、风俗、制度、宗教和语言的研究。该书节录了他作为加尔各答亚洲学会会长分别于1786年2月2日和1792年2月23日的两次讲演稿,内容涉及东方民族与家庭的起源问题。这种有关人类发展史和伦理道德的东方思想促进了西方有关哲学领域的发展。德国批评家和浪漫主义的先驱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是具有浪漫主义的印度狂热崇拜者,当然也涉及中国。他长期在法国从事东方学研究,成了欧洲的东方学先驱之一。该书摘录了他的名著《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中的片断(当时西方人在“印度人”和“中国人”之间很难作出明确区别),实际上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其兄威廉·施莱格尔(Wilhelm Schlegel, 1767—1845)是德国作家和浪漫主义运动的促进者,以介绍“东方的文艺复兴”而著名,曾于1820—1830年出版过三卷本的《印度文库》。该书摘引了他于1833年11月20日写的《论印度人的起源》一文,其中也大量论述了中国民族起源的问题,意欲“重写”整部人类发展史。德国哲学家、外交家、教育家和语言学家洪堡(W. von Humboldt, 1767—1835)的著作曾被时人认为是“通向中国和印度的走廊”。他对于东西方语言的比较研究已超越了语言的范畴,被称为一次酷似“哥白尼式的革命”。1826年3月7日,他自柏林致信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设立于1814年,国外第一个汉学讲座)主持人雷慕沙,向雷氏请教汉语的语法特征,特别是有关汉语之天才问题。该书全文刊登了这封书信。这是西方最早以真正科学的方法研究汉语语法的论著,为向西方揭开汉语的神秘面纱作出了巨大贡献。

西方哲学家受中国的影响,其媒介依然是入华耶稣会士们,其资料来源始终是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著述。事实上,正是入华耶稣会士们通过这些西方哲学家,而掀起了一场震撼整个欧洲的“中国热”风潮。

法国学者雅克·布罗斯(Jacques Brosse)于1981年出版的《西方发现中国史》一书,图文并茂、生动活泼地介绍了西方“发现”中国以及中国在西方影响的历史。其中,第一章《中西方最早的接触》,是讲15世纪之前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章《从瓷器到神学》,介绍了由入华耶稣会士们掀起的16—18世纪欧洲“中国热”高

潮。中国瓷器于16世纪传入欧洲,在物质领域中掀起一场“中国热”。最早的瓷瓶是由葡萄牙人于1520年输入欧洲的,欧洲人不明白中国人是怎样从碎泥土石中得到这种色彩夺目和响声清脆的神奇器皿,认为它是上帝创造的一种“奇迹”。欧洲君主和达官显贵们都以黄金的价格争购这些异国艺术品。欧洲第一批收藏中国瓷器者是佛罗伦萨之圭美第奇(Medicis)、法王法兰西斯一世(Francois I)和德国的查理五世(Charles Quint)等家族。荷兰商人很快就垄断了葡萄牙运往欧洲的中国瓷器,英王雅克一世和亨利四世都是阿姆斯特丹中国瓷器的大买主。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世纪上半叶就进口近三百万件中国瓷器。这一切对欧洲彩釉陶器的发展施加了很大的影响。不仅荷兰德尔夫特的蓝色和白色彩釉器是由于直接模拟中国瓷器才造成,而且法国讷韦尔、鲁昂和斯特拉斯堡的彩釉器作坊也深受中国瓷器的影响。荷兰于17世纪末丧失了对中国瓷器的垄断权,英、法列强的东印度贸易公司争相从事中国瓷器贸易。法国于1720年还专辟一个进口中国瓷器的港口洛里昂(Lorient),该名出自法文中指“东方”的L'orient一词。路易十四用带金柄的中国瓷杯喝酒,当时的人都想用中国瓷杯喝热饮料。所以,订购成套的中国瓷器成了交易热点,中国瓷窑也严格按照欧洲订货所要求的图案和式样生产。当时,还出现了带圣母和维纳斯图像的中国瓷器,甚至还印有西洋文字母。欧洲的陶瓷专家们积极努力地揭示中国瓷器的奥妙。他们在二百多年里,先用加锡的不透明玻璃来仿造,后又制造软胎瓷;17世纪末,一种仿制中国“工艺品”的热潮风行欧洲,以取代中国进口的货物。欧洲人还想设法地揭示中国瓷器的工艺成分和配方的秘诀。萨克斯国王的囚犯炼丹术士波特格尔(Btuger)于1709年在迈森附近找到了“高岭土”,又于1710年在那里生产出欧洲第一批硬胎瓷。他对此严加保密,故意使瓷器的生产笼罩着一种炼丹术般的神秘色彩。这种热潮于1745—1755年间经蓬巴杜侯爵推动而达到顶峰。欧洲列强的东印度公司大批进口中国货,中国戏剧也被搬上欧洲舞台,社会名流们专辟“中国工艺品陈列室”。英国著名家具设计师奇彭达尔(Chippendale)模拟中国家具而推出新款式,形成了欧洲珍贵家具名牌;法国的木器工马丹(Martin)模仿中国漆而制成了马丹油,根据中国图案而在博韦编织的法国地毯上绘画,又作为重礼进奉乾隆皇帝。中国的园林风格也风靡欧洲,被称为“英国式”的法国园林实际上是受由钱伯斯(W. Chambers)曾就地研究过的中国园林的影响。钱伯斯模仿苏州塔而修建著名的丘园塔,舒瓦齐(Choisy)在十二年之后于法国香特鲁也建起中国塔。作者在论述

了这些物质文化的传播之后,还讲到了经入华传教士们的媒介而使中国思想、哲学、伦理和宗教文化西传的情况。

曾在中国工作过数十年的法国白俄裔学者米桓(Constantin Milsky)的法籍夫人于1975年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过了其博士论文《法国18世纪的中国的情趣》。该书恰恰是贝勒维奇—斯坦凯维奇有关17世纪中国热一书的续篇。它主要是通过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冯秉正(de Mailla, 1669—1748)神父《中国通史》(在他去世后于1777—1785年共分十二卷出版)一书的530名预订者的名单,全面分析了法国18世纪参与“中国热”高潮的社会基础和地理范畴。从地理范围来讲,巴黎的“中国热”势头最大,在已考证清楚的474名预订人中占326人;其次是波尔多(48人)和南方的马赛、图鲁兹、蒙特利埃等城市,法国北方的预订人则极少。从社会阶层来看,贵族占349名,平民只有140人。所以,参与“中国热”的人主要是王室、贵族、官吏、律师、医师、艺术家、学者和富商等。在这些人中,军人(佩剑贵族)85人,神职人员69人,金融界41人,商业的产业阶级13人。总而言之,法国18世纪“中国热”的特征是:法国的重农派学者们具有理想和神秘的中国之形象,他们把中国视为“最智慧的国家”;商人们是具有“遍布珍异物和财富”的中国之理想,他们将中国以及整个东方视为财富之源;自由职业者们怀有崇尚“以深厚情趣和雅致而生活”的中国之信念,形成了浪漫中国之形象;学者们却形成了一种有关“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国之观点,将中国视为礼仪和文明之邦。

法国的波兰裔学者贝勒维奇—斯坦凯维奇(Belvitich—Stankevich)的旧作《路易十四时代的中国热》一书于1972年在日内瓦重版。该书共分两编七章。其中,第一编是讲法国在16—17世纪时掀起的“东方探险热”中热衷于赴中国和远东旅行的历史。第二编第一章是《法国宫廷中的中国珍异物》,详细论述了路易十四国王、王后、太子和宫中其他显贵们,均以使用中国家具和其他中国装饰品为时髦的历史。甚至连路易十四的特里亚农宫(现法国总理府)也充满了中国情趣,豪华地装饰着中国印花布、织锦和人造花,最受青睐的中国珍品仍是瓷器和漆器。第二章是《商人和中国珍异物》。当时,欧洲商人以巨额采购“中国珍异物”并以此发财致富。欧洲人在节庆时以用中国瓷器做装饰为高贵,在化装舞会上以穿中国服装为高雅,欧洲不同阶层的人都对中国艺术大加赞美。第三章是《东方服饰风行欧洲》。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大批进口中国布帛,欧洲上层和富翁对于中国衣饰如醉如痴,因而激起了某些人为反对东方奢侈豪华时髦而进行抨击。第

四章是《带有中国内容的雕刻图案》。路易十四是“中国热”最早的推动者,他令人将其出使暹罗使节的画像雕版印刷,后来又刻印了带有暹罗和中国内容的历书,祈尔歌的《中国图志》便是中国物品雕刻图案的代表作。欧洲人热衷于将耶稣会士和商人们携回的中国珍异物与图案雕版印刷,以使之广为流传。最典型的例证是康熙皇帝及其官吏们的肖像、文士和仕女图等,其中所谓的“中国人”千奇百怪。那些从未见过真正中国人的画家们都凭各自的想象而杜撰,无论当时流行的中国观念是否正确。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确实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中国热”浪潮。

法国于18世纪出版的《耶稣会士书简集》(1702—1776,三十四卷本,后来又出版过许多种改编本)是研究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的三大基础著作之一,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套著作也曾被以不同的形式多次节录再版。法国于1979年出版了普罗旺斯大学的维席叶夫妇(Isabelle et Jean—Louis Vissière)选编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其中除了一篇价值很大的序言和有关事件的年谱之外,主要是选编或摘编了一批耶稣会士中国书简,其中涉及中国犹太人、种痘术、宫廷内幕、各种宗教、瓷器生产、工农业、建筑风格、风土人情、清宗室王公苏努一家受归化等内容。此书在中国大陆已有朱静的中译本,故不再赘言。

欧洲在17—18世纪的“中国热”风潮中,中国的形象、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等,成为了一批政客、学者、作家和艺术家们热衷于谈论的话题。入华耶稣会士们在华搜集到了一大批有关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婚丧嫁娶、历法节庆、占卜堪舆、神鬼迷信、待客访友、喜怒哀乐等方面的生活“琐事”的资料。法国学者后来将它们搜集起来,出版了两部代表作。其一是夏尔·科莫(Charles Commeaux)于1970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清代人的日常生活》,该书列入了法国颇具声望的一套畅销书《日常生活》丛书。其二是1982年出版的由舒特(Joseph Schütte)主编的一部图文并茂的工具书《利玛窦和其他入华耶稣会士论中国的艺术和日常生活》。上述两部著作都介绍了中国人在明末清初的日常生活。当时,在欧洲贵夫人沙龙和戏剧舞台、文学作品、艺术造型中,中国形象风靡一时,甚至在某些学术著作中也有反映。欧洲的一批政客、学者、艺术家们,为了在欧洲发动“反无耻之战”,需要借助于中国形象。他们大都海阔天空,甚至是云山雾罩地谈论那个连他们自己也根本不了解的中国,把中国人的生活描绘成了一种理想的形象。

葡萄牙耶稣会士们于17世纪上半叶便进入了西藏。法国学者于格·迪迪埃(Hugues Didier)于1996年出

版了《葡萄牙人在西藏》一书。其第一部分是讲扎巴让(古格)建立的葡萄牙传教区。主要是译注和介绍了1624—1635年间进入中国西藏的葡萄牙耶稣会士们的基本情况。书中发表了葡萄牙耶稣会士安德拉德(Antonio de Andrade, 1580—1634)于1624年和1625年的两次入藏记述,主要是在西藏西部的古格境内,特别是在扎巴让(札达)地区探险;还发表了他1624年和1627年写成的几篇游记(以书简的体裁写成),以及弗朗西斯科·德·阿泽维多(Francisco de Azvedo)于1631年的入藏游记。第二部分是讲在西藏建立的葡萄牙传教区。书中译注了卡塞拉(Estevo Cacula)1627年为寻找契丹(Cathay)和蕃坦(Potente)而入藏旅行,卡布拉尔(Joan Cabral, 1598—1669年)于1628年在卫藏的活动。第三部分是历史档案,分别论述了欧洲在寻找“外部基督教国家”、福音化与异教—基督教的混合组成、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之间相会等内容。安德拉德是18世纪下半叶之前西方唯一研究西藏的神学权威。除了耶稣会士们的圈子之外,在1624—1626年间,欧洲人对于西藏现状的了解,主要是葡萄牙人安德拉德向他们介绍的情况,尽管他的资料中有许多错误和不确切处。阿泽维多、卡塞拉和卡布拉尔则向西方揭示了藏传佛教,但却不是扎巴让而是卫藏的佛教。他们四个人开创了一系列葡萄牙传教士入藏活动的先河。

入华耶稣会士们于18世纪从事了大量对开封犹太人的调查。法国学者纳丁·佩伦(Nadine Perront)于1998年出版了一本《中国的犹太人,开封与上海犹太人社团的神奇历史》。作者首先在序言中详细地介绍了由入华耶稣会士们首开的对开封犹太人进行调查研究,并由政界、商界、学术界继续的这场运动,持续了三个多世纪的历史。其后,又介绍了中国犹太人的历史年代、进入中国的路线、在中国最早的居住地。对于开封犹太人,书中介绍了他们的民族和地域起源、到达开封的时间、人数与姓氏集团、犹太教堂、希伯来文抄经、节庆、礼仪与禁忌、语言与相貌、被同化的原因。这一切资料,基本上都是由入华耶稣会士们调查而获得的成果。

法国在主办有关入华耶稣会士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方面,有几项活动具有深远的国际影

响,其成绩令人刮目相看。

其一是自1974年以来,由已故的前入华耶稣会士裴化行(Henri-Bernard Matre, 1889—1975)和荣振化倡导,每三年在尚蒂伊耶稣会档案馆举行的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现已召开了十届,并出版了历届讨论会的论文集。前四届均由法国方面主持,其内容完全是有关入华耶稣会士问题的。但自第五届美国人介入后,内容开始变得广泛了。不过从第八届起,又出现了恢复老传统的倾向。这套会议论文集集中了世界各国学者们的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其二是由法国的谢和耐与荷兰的许理和于1990年共同发起的一项欧洲计划,叫做“欧洲在中国:17—18世纪的文化、科学和宗教的相互影响”,以中国一方为研究中心。他们分别于1991、1993、1996和2000年举行过四次学术讨论会,并已出版了文集。该项计划是谢和耐著作的延续,也与许理和于其宗教史著作中的观点相吻合。它试图将有关这一主题的所有领域(宗教、艺术、科学……)都密切地结合起来。

1995年3月,在巴黎召开了“学者和政治家徐光启”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文集。会议集中了来自欧洲、美洲和东亚的一批学者,从明史、宗教史和科学技术史诸方面研究了徐光启。它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已往对徐光启“科学家”、“爱国者”和“基督教的台柱子”等等的定位,把他放在了明末中西文化交流与撞击的政治文化大背景中来研究。

法国的利氏学社(Institut Ricci, 利玛窦研究所)成立于1966年,旨在继续利玛窦及其继承人们所从事的汉学研究。因为利玛窦虽为意大利入华耶稣会士,但法国人华耶稣会士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 1835—1919)和戴遂良(Lon Wiéger, 1856—1933)先以河北献县为中心,后来又有法国耶稣会士们于上海以徐家汇为中心,继承过耶稣会士们的汉学研究事业。利氏学社分别在中国台北、香港和法国巴黎设立分社。他们在辞典编纂、语言学、甲骨学、中国哲学、儒释道三教、民间宗教、史学和文学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不少成绩。该社于1976年出版了《汉法综合辞典》(俗称《利玛窦小辞典》),于20世纪90年代又出版了《汉法大辞典》(《利玛窦大辞典》)。

## Research on the First Cultural Impa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French Sinology

GENG Sheng

(Institute of Histor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French sinology got more results in the spread of Chinese Learning to the West than in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to China. The paper comments on the studies of French Sinologists during twenty years.

**Key Words:** first cultural impa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16~18 century; French sinology

[责任编辑、校对:田卫平]

# 法国汉学界对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下)

作者: [耿昇](#)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刊名: [河北学刊](#) PKU CSSCI  
英文刊名: [HEBEI ACADEMIC JOURNAL](#)  
年, 卷(期): 2004, 24(2)  
被引用次数: 1次

## 相似文献(3条)

### 1. 期刊论文 [耿昇](#) 法国汉学界对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上) - [河北学刊](#) 2003, 23(4)

明末清初的16—18世纪, 是中西两种文化首次撞击的时代。这次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流媒介, 是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无论是在中学西渐方面, 还是在西学东渐领域中, 都做了许多有益的、他人无法取代的工作。他们在华的传教事业基本上是失败的, 或者说是收效甚微, 但他们在中西文化(哲学、史学、经济、伦理、政治、语言文字、科学技术等)交流方面成绩斐然。他们在中学西渐方面取得的成绩比在西学东渐方面更大。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 法国汉学界在该领域中始终居领先地位。本文对法国汉学界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鸟瞰式评介。

### 2. 期刊论文 [耿昇](#). [GENG Shen](#) 从基督宗教的第3次入华高潮到西方早期中国观的形成 -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2)

基督宗教的首次入华高潮是唐代的景教徒, 第2次高潮是元代的方济各会士, 第3次入华高潮则是明末清初的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多个修会的传教士。入华耶稣会士来自欧洲几乎所有国家, 但以南中欧拉丁文化的国家为主。他们的社会出身一般较高贵, 故来华后走上层路线, 广交上至朝廷, 下至文人儒士, 推行中国文化“适应政策”。他们在传教方面收获不大, 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却功不可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 对于中学西渐的贡献, 还要大于其对西学中渐的贡献。他们的书简、报告和著述, 促进了西方早期的中国观的形成。

### 3. 学位论文 [刘亚轩](#) 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研究 2009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 明末清初是一个辉煌的时期。在这一时期, 众多西方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 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桥梁, 使中西双方的认识和沟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此, 国内外的学术界已经有诸多论著。可是, 对来华的非耶稣会传教士为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 我们的研究则明显滞后。关于清初来华的虔劳会士马国贤的研究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通过本文对马国贤深入细致的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 马国贤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人物, 他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马国贤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 1、马国贤的中国观对欧洲18世纪中国热的降温起了重要的作用。
- 2、马国贤的回忆录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大门, 为学者们研究康熙时的中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
- 3、在中西美术交流史上, 马国贤第一次把西方的铜版画技术传入中国, 改变了以往中国只是制作木版画的传统。马国贤制作的铜版画《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促进了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中国园林热。
- 4、马国贤为研究中国礼仪之争提供了更多更珍贵的材料。在礼仪之争中, 欧洲社会的很多人士不再相信入华耶稣会士的报告。马国贤的报告恰好在此时出现, 因而对当时的欧洲影响更大。
- 5、在中国留学史上, 马国贤在其家乡那不勒斯创办的中国学院, 是欧洲最早的中国人留学中心。中国学院体现了马国贤与利玛窦的适应路线不同的另外一种传教方法, 在清朝厉行禁教时期, 为中国的传教事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马国贤的个案研究表明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 来华的传教士无论何门何派, 无论其主观立场如何, 都不自觉地充当了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桥梁, 也说明我们急需加强对在华的非耶稣会士的研究, 唯其如此, 才能更好地揭示明末清初这场大规模文化交流的全貌。

## 引证文献(1条)

### 1. [何谐](#) 法国耶稣会士的中国研究及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期刊论文] - [攀枝花学院学报\(综合版\)](#) 2007(2)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bxk200402037.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bxk200402037.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bac812fd-a77e-4eb1-89c9-9e4d0084cae3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